

大学生日本观影响因素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沙莎

摘要: 本文以 2008 年 11 至 12 月在厦门大学三年级生中进行的“大学生日本观及其影响因素调查”为基础,描述了大学生日本观及其影响因素的现状并构建回归模型,运用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对大学生日本观的形成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社会化过程、受教育水平、直接接触与自我检控等社会心理因素对大学生日本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日本观 大学生 认知 情感 行为倾向 社会心理

导 言

二战以来,中日关系旧怨新恨丛生,矛盾摩擦不断,成为两国人民乃至亚洲人民关注的焦点。围绕着两国人民的中国观与日本观,两国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中日官方也曾携手分别抽取两国大学生样本调查其对对方国家的态度。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大学生的反日情绪鲜明,情感成因复杂。

但是,已有研究对“日本观”的定义不明,没有相对稳定而统一的测量指标;描述性研究居多,解释性研究偏少,无法找出日本观形成的影响因素;调查样本局限于东北、北京、南京等历史上曾被直接侵略与占领的地区或城市,对其它地区的大学生关注较少。

本研究主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侧重对大学生日本观进行系统化测量,旨在描述大学生日本观及其影响因素的现状并构建相应模型,运用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对大学生的日本观进行分析。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所用的问卷资料来源于课题组成员于 2008 年 11 至 12 月在厦门大学三年级生中进行的“大学生日本观及其影响因素调查”¹。当年厦门大学的三年级生分布在 17 个学院(含 40 个系),调查按照随机原则在其中抽取了 31 个系以

¹ 问卷调查由七位课题组成员共同完成,本人承担分析与撰稿工作,在此向贾如、王丽丽、安智超、吴玮、徐秋艳、管运斌六位成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及 20 名港澳台学生，共发放问卷 420 份，回收 410 份，回收率为 97.6%。在成功访问的调查对象中，男生占 55.7%，女生占 44.3%。

从出身省份上看，调查对象来自中国的 33 个行政单位，其中福建学生占 44.8%。从城乡差异上看，调查对象中来自城市的占 35.3%，城镇 33.3%，农村 27.0%，偏远农村 4.4%。在“家乡是否曾被日军长期占领”这一问题上，回答“是”的受访者占 24.8%，回答“否”的 54.3%，“不清楚”的占 20.8%。家庭经济水平方面，调查对象的家庭月总收入(父母月收入之和)较高的占 5.8%，中等水平占 26.4%，较低的占 67.8%。家庭文化程度方面，调查对象的父母学历较高的占 13.6%，中高的占 17.2%，中低的占 32.3%，较低的占 36.9%。

二.大学生日本观的构成及现状

本研究使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J.L.Freedman 对态度的解释定义日本观，认为日本观即个体对日本国及其国民相对稳固的由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成分组成的心理倾向。

(一)对日认知成分的构成及现状

认知成分是指人们对日本国及其国民的心理印象，研究采用选择与填空两种形式，设计了十道问题分别考察受访者对日本国情的不同方面的认知水平，请受访者写出他们认为正确的答案，十个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达 79.53%。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对日认知有以下特征：一，在最高值为 10 的测试中，大学生对日认知的平均水平只有 4.72，对日本的客观情况了解甚少；二，相比较而言，大学生对日本军事、经济、教育、体育四个领域基本情况的了解大于人口、政党、政治、地理、交通和文化领域。

(二)对日情感成分的构成及现状

情感成分是指人们对日本国及其国民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情感，是日本观的核心与关键。调查分别询问了受访者对日本政府、日本人民、日本文化、中日关系发展及中日交往中出现的极端群体(哈日与愤青)的基本评价与态度，问题的答案分为“非常积极/喜欢”、“比较积极/喜欢”、“比较矛盾”、“不太关心”、“比较消极/厌恶”与“非常消极/厌恶”六个等级，除“愤青群体”的赋值由 1 至 6 依次递增外，其它项目的赋值依次递增，将各项得分叠加得到对日

情感成分总值。情感总值区间为 6 至 36，值越大，则对日本的好感度越大。这组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达 62.66%。

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对日情感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在最高值为 36，最低值为 6 的情感成分测试中，大学生的对日情感值平均只有 18.80(标准差 4.76)，从总体上看趋于消极；二是对日本文化(45.5%)、日本人民(29.9%)和日本政府(4.4%)抱有好感的受访者比例依次递减，显示出大学生对待日本的态度已经摆脱了“一刀切”的思维局限，具有一定的理智性；三是对愤青群体的评价(厌恶者占总人数 44.1%)大大高于对哈日群体的评价(厌恶者占 71.5%)；四是还有一部分受访者持矛盾态度。

以上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的日本观不能用“反日”一词一概而论。虽然本研究发现对日情感平均值处于较低水平，但对日本文化抱有好感的比例为 45.5%，这一统计结果与卢德平博士于 2002 年对北京三所著名高校的 248 名大学生实施的问卷调查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他的研究中，对日本文化持否定态度的人高达 72%。

(三)对日行为倾向成分的构成及现状

行为倾向成分是指人们对日本国及其国民所预备采取的反应，具有准备性质。研究根据不同行为所显示的对日情感强度列举了由购买日本产品到在日本工作或居住的一系列积极行为与三项在中国常见的反日行为，请受访者选择相应的行为意愿，答案分为“非常愿意”、“比较愿意”、“不太愿意”和“很不愿意”，除三项反日行为的赋值由 1 至 4 依次递增外，其余项目的赋值依次递减，将各项得分叠加得到对日行为倾向总值。行为倾向总值区间在 11 至 44 之间，值越大，则对日行为倾向越积极。该组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达 86.72%。

经分析，大学生的对日行为倾向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在最高值为 44，最低值为 11 的行为倾向成分测试中，大学生的对日行为倾向平均值为 29.57，与认知、情感成分相比较居于较高水平，即大学生在对日行为倾向上趋于积极；

二，从选择了“非常愿意”与“比较愿意”的受访者比例上看，大学生能够接受的对日行为基本按照与日本的亲近程度依次递减，分别是：购买日本产品(76.9%)、了解日本文化(73.6%)、结交日本友人(71.1%)、赴日旅游(68.3%)、学习

日语(59.0%)、赴日留学(42.8)、进入日资企业工作(42%)和在日本工作或居住(24.3%)。

三，三项反日行为的接受程度均较低：在媒体上(包括网络)上发表反日言论(21.2%)、参加反日游行(22.8%)、直接反对持日货者、亲日者或日本人(14.0%)，可见大学生在考虑对日行为时能够付诸理性，并不十分激进。

(四)大学生日本观的现状

将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成分的测量值叠加，得到一个区间为[17, 90]的日本观总值。分析发现，大学生的日本观总值平均为 53.03(标准差 10.28)。为更清楚地描述这一统计结果的意义，根据集中趋势与离散程度将总值分为四个层次，可知对日本的心理倾向趋向极端的受访者比例为 31.2%，其中非常积极的占 18.0%，非常消极的占 13.2%。而对日心理倾向处于中间水平的受访者比例达 65.1%，其中，比较消极的受访者比例(34.6%)大于比较积极的受访者比例(30.5%)。从总体情况上看，对日心理倾向积极的受访者(48.5%)略多于消极的受访者(47.8%)。

在调查中，本研究请受访者写下两个最能代表心目中的日本形象的词语(名词、形容词、人名等均可)。根据统计结果，在受访者填写的 550 个词语当中，贬义词比例最高(31.64%)，褒义词占有出现词汇的 20.36%，中性形容词 8.18%。此外，当代艺人对大学生心目中日本形象的塑造发挥的作用(2.18%)大大多于历史人物(0.55%)。

三.影响大学生日本观各因素的构成与现状

本研究认为，日本观的形成与以下几项因素可能存在密切关系：首先，日本观的形成机制可能包括与日本某些特定事物的联结、观念受到奖励或惩罚的强化和模仿榜样人物(如父母)；其次，由于偏见更多地来源于无知与狭隘，日本观的形成可能与态度主体受到的相关教育的水平有关；再次，日本观的形成还可能受到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的影响，即人们对日本国及其国民的态度可能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加而变得更积极；最后，自我检控也可能对大学生调整日本观起到一定作用，通过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等认知过程，态度主体可能纠正自己原先的不

公正观念。研究重点对以上四个因素进行了考察。

(一)社会学习因素的构成及现状

社会学习即社会化过程，包括重要家人和朋友的态度以及媒体的引导对认知主体观念形成施加的影响。本研究将社会学习分为重要他人及社会媒体的影响两类，针对前者，分别询问受访者的父亲、母亲、祖辈、兄妹和亲密朋友对日本国与日本人的基本态度，问题的答案分为“非常消极”、“比较消极”、“不太清楚”、“中立”、“比较积极”、“非常积极”六个等级，依次赋值 1 至 6 分；针对后者，选取了十项中日关系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日本呈正、负面形象的信息各占五项)，询问受访者对信息的熟悉程度，问题答案分为“非常了解”、“有点了解”、“不太了解”、“没听说过”四个等级，赋值 1 至 4 分。其中，日本呈负面形象的信息以答“非常了解”为最低分，反之以答“非常了解”为最高分。该组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达 77.6%。

对重要他人影响因素进行描述统计，针对不同主体对日本国与日本人的基本态度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在对日本国的态度方面，父母、亲密朋友和兄妹对日本国的态度均比祖辈更积极；在对日本人的评价方面，由高到低分别是亲密朋友与兄妹、父母、祖辈；而不同主体自身对日本国与日本人的态度方面，只有祖辈和亲密朋友对日本人的态度显著高于对日本国的态度。

对媒体影响因素进行描述统计，发现宣传日本负面形象的信息接受度普遍较高，其中，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事件的知晓率达 90% 以上，而传达日本积极形象的信息知晓率则大大低于前者，除“田中角荣访华”一项外，其余事件的知晓率都低于 50%。

根据主成分法对社会学习的 20 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抽取四个因子(表 1)。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些因子分别命名为“长辈态度因子”(包括父亲、母亲、祖辈对日本国与日本人的基本态度)、“同辈态度因子”(亲密朋友与兄妹对日本国与日本人的基本态度)、“正面信息因子”(对五项日本形象积极的信息了解程度)、“负面信息因子”(对五项传达日本负面形象信息的了解程度)。可见，在受访者的重要他人中，长辈们对日本的态度明显与其同辈群体有别，而在媒体的影响方面，正面信息的接受程度远低于负面信息。这些因素都可能对日本观的形成造成影响。

表 1 日本观社会学习的因子分析

| 项目 | 长辈态度 因子 | 正面信息 因子 | 同辈态度 因子 | 负面信息 因子 | 共量 |
|--------------------------|------------|------------|------------|------------|--------|
| 父亲对日本国的基本态度 | .840 | -.086 | .237 | .092 | .777 |
| 母亲对日本国的基本态度 | .846 | -.065 | .241 | .145 | .800 |
| 祖辈对日本国的基本态度 | .714 | -.112 | .230 | .176 | .607 |
| 亲密朋友对日本国的基本态度 | .327 | -.079 | .809 | .145 | .788 |
| 兄妹对日本国的基本态度 | .433 | -.087 | .769 | .068 | .791 |
| 父亲对日本人的基本态度 | .877 | -.036 | .253 | .001 | .835 |
| 母亲对日本人的基本态度 | .852 | -.037 | .261 | .055 | .798 |
| 祖辈对日本人的基本态度 | .759 | -.103 | .280 | .123 | .680 |
| 亲密朋友对日本人的基本态度 | .382 | -.072 | .804 | .057 | .800 |
| 兄妹对日本人的基本态度 | .438 | -.043 | .800 | .007 | .833 |
| 了解日本修改和平宪法 | .052 | -.471 | .191 | .527 | .539 |
| 了解小泉纯一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 | .089 | -.135 | .079 | .869 | .788 |
| 了解钓鱼岛事件 | .125 | -.167 | .077 | .824 | .729 |
| 了解齐齐哈尔日军遗弃化学毒剂伤人事件 | .150 | -.264 | -.024 | .726 | .620 |
| 了解温家宝总理 2007 年“融冰之旅” | .051 | -.668 | .092 | .444 | .655 |
| 了解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 | -.119 | .663 | .018 | -.338 | .569 |
| 了解日本对华实施发展援助 (ODA)，如日元贷款 | -.083 | .807 | -.086 | -.116 | .680 |
| 了解小泉对日本侵华历史表示反省和道歉 | .047 | .564 | -.077 | .006 | .326 |
| 了解安倍晋三 2006 年“破冰之旅” | -.100 | .796 | -.105 | -.249 | .717 |
| 了解 2008 年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 | -.119 | .711 | .083 | -.069 | .531 |
| 特征值 | 4.733 | 3.392 | 2.999 | 2.740 | 13.864 |
| 平均方差 | 23.666 | 16.960 | 14.993 | 13.698 | 69.318 |

(二)受教育水平因素的构成及现状

受教育水平主要指态度主题所受的与日本国及其国民有关的教育情况及其体验，设计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项：第一，计算受访者选择“喜欢”的日本文化种类多少，若选择“日本文化都不喜欢”则赋值-1分；第二，受访者是否参观过二战纪念馆，回答“是”则赋值0分，反之赋1分；第三，受访者接触的与日相关文化产品的数量，包括中国拍摄的二战影片、专门描写日本或中日关系的书籍、日本作家的作品、日本电影和电视剧以及日本音乐家和歌手的音乐，答案分

为≤5、5-10、10-20、20-50、≥50 五个层次，依次赋值 1 至 5 分。该组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68.86%。

对受访者喜欢的日本文化种类进行分析，发现日本动漫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远高于其他文化种类，选择“喜欢”的受访者达 73.4%。而在其余文化种类中，接受程度排在首位的是 AV(31.1%)、游戏与音乐(25.9%)、影视(22.7%)、文学(16.3%)和恐怖片(14.6%)。喜欢体育及其他文化种类 (包括插花、茶艺等)的受访者比例均低于 5%。

在接触的与日相关文化产品的数量方面，受访者接触得相对较多的是日本电影和电视剧，有 60%受访者接触的数量在 5 部以上；其次是中国拍摄的反映二战的影片(接触数量在 5 部以上的受访者占总人数比例的 52.9%)和日本音乐(听过五位以上音乐家和歌手作品的比例为 45.5%)。专门描写日本或中日关系的书籍和日本作家的作品则较少有人问津，多数受访者接触的数量在五部以下。

根据主成分法对受教育水平的 7 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抽取两个因子(表 2)。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些因子分别命名为“正面教育因子”和“负面教育因子”。前者包括喜欢的日本文化种类计数、看过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数量、听过其音乐的日本音乐家或歌手数量、看过的日本作家的作品数量；后者则包括是否参观过二战纪念馆、看过的中国拍摄的反映二战的影片数量、看过的专门描写日本或中日关系的书籍数量。可见，接触的与日相关产品并非越多越有利于形塑客观的态度，文化产品本身亦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性，二战纪念馆、中国拍摄的影片与日本本土文化对态度主体的影响必然不同。

表 2 日本观受教育水平的因子分析

| 项目 | 正面教育因子 | 负面教育因子 | 共量 |
|---------------------|--------|--------|--------|
| 喜欢的日本文化种类计数 | .780 | -.109 | .620 |
| 是否参观过二战纪念馆 | .044 | .233 | .056 |
| 看过的中国拍摄的反映二战的影片数量 | -.037 | .836 | .700 |
| 看过的专门描写日本或中日关系的书籍数量 | .335 | .688 | .586 |
| 看过的日本作家的作品数量 | .542 | .512 | .556 |
| 看过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数量 | .759 | .224 | .626 |
| 听过其音乐的日本音乐家或歌手数量 | .743 | .298 | .640 |
| 特征值 | 2.145 | 1.640 | 3.785 |
| 平均方差 | 30.642 | 23.423 | 54.065 |

(三)直接接触因素的构成与现状

直接接触主要指态度主体是否曾经与日本国及其国民发生过直接接触及其体验，通过以下三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否接触过日本人及接触后的整体印象；二，是否去过日本及接触后对日本的整体印象；三，是否接触过日本商人与日本人提供的商品、服务及其印象。直接接触后印象的答案分为“很好”、“比较好”、“一般”、“不太好”、“很差”五个层次，依次赋值 2 至-2 分，未发生过接触亦赋值 0 分，将三项印象值叠加，得到直接接触后印象值。值越大，即直接接触后印象越好。

分析发现，受访者与日本商人、商品及服务的接触机会较多(直接接触过的比例达 83.8)，大部分受访者对其印象比较好(44.9%)或一般(39.4%)。直接接触过日本人的受访者仅占总人数的 26.7%，在这部分受访者当中，表示对日本人的印象“不太好”或“很差”的比例仅有 5.6%，有 64.2%的人表示印象“很好”或“比较好”。去过日本的受访者更是只有 3.5%，没有人表示对其印象“不太好”或“很差”，大部分受访者的直接接触后印象是“很好”(21.4%)或“比较好”(57.1%)。本研究认为，这些直接接触后的体验可能对受访者的日本观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自我检控因素的构成与现状

自我检控主要指态度主体在认知过程中是否曾经经历过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本研究设计的考察内容包括是否反思过自己对日本的想法与态度，是否关心日本发展与中日关系，认为自己是否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是否思考过日本人如何看中国以及促成反思的力量强度五项，依实践程度赋值并将各项得分叠加，得到自我检控程度值。值越大，则态度主体在日本观形成过程中所经历过的自我检控水平越高。该组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69.53%。

分析发现，在对日问题上，有 74.3%的受访者曾经经历过反思。对这部分受访者进行分析，促成反思的力量主要来自学识的增长(68.3%)、网络信息(36.0%)、民族情感的压力(31.7%)和主流媒体的报道(29.4%)，重要朋友、直接接触的影响相对较小，分别只有 18.5%和 14.2%，而父母、祖辈的力量则分别仅有 2.3%和 5.3%。可见在大学生反思对日情感态度的过程中，知识教育、社会媒体和民族情感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长辈的影响则显得微弱。

在其余几个方面，关心日本发展与中日关系的受访者比例为 67.1%，思考过

日本人如何看中国的受访者也有 60.4%，但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不太了解”(75.6%)日本人的国民性或“不想了解”(10.0%)。在历史问题上，有 43.6%的受访者认为大部分日本人不愿认错，16.1%认为大部分日本人感到羞愧，只有 28.7%的受访者做出比较符合日本国情的回答。

四.影响大学生日本观的因素的回归分析

在考察各种客观因素及社会心理因素对大学生日本观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本研究将性别、城乡差异、家乡是否曾被日军长期占领、家庭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条件与四项社会心理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对大学生日本观及其三个成分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 3)。在回归分析的模型中，除性别为虚拟变量外(参考类别为女性)，其余变量均为数值型。

表 3 影响大学生日本观的因素的回归分析(标准回归系数)

| 解释变量 | 认知成分 | 情感成分 | 行为倾向成分 | 日本观 |
|----------------|------------|------------|------------|-------------|
| 性别 | .206** | -.095 | -.163** | |
| 城乡差异 | .013 | .162* | -.021 | |
| 家乡是否曾被日军长期占领 | -.005 | .000 | -.031 | |
| 家庭文化程度 | -.018 | -.139* | -.032 | |
| 家庭经济水平 | -.067 | .010 | .051 | |
| 社会学习: | | | | |
| 长辈态度因子 | -.139** | .070 | .046 | .074 |
| 同辈态度因子 | -.031 | .211*** | .155** | .154*** |
| 正面信息因子 | .096 | .045 | .054 | .049 |
| 负面信息因子 | -.274***** | .009 | .026 | .011 |
| 受教育水平: | | | | |
| 正面教育因子 | .114 | .271*** | .370***** | .357***** |
| 负面教育因子 | .101 | -.139* | -.193*** | -.041 |
| 直接接触 | .298***** | .224*** | .250*** | .324***** |
| 自我检控 | .154* | .157* | .075 | .146*** |
| N | 154 | 153 | 153 | 245 |
| R ² | 35.2% | 31.8% | 37.6% | 44.8% |
| F 检定值 | 7.404***** | 6.463***** | 8.034***** | 25.731***** |

说明: *p≤0.10, **p≤0.05, ***p≤0.01, ****p≤0.001

表 17 的分析结果表明:

1.性别对日本观认知成分与行为倾向成分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男生的对日认知水平高于女生 0.2 分，而在对日行为倾向上则比女生更加消极。这一结果

是否可以说明女生的对日态度相对宽容而男生的对日态度更加激进,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城乡差异仅对日本观情感成分具有显著影响,即出身城镇的大学生对日本的态度较出身乡村的更为积极。这可能与城镇大学生享有更多的与日接触机会和更丰富的信息有关。由于这种影响比较微弱且在其余三个模型中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城乡差异是否是塑造不同日本观的原因之一,我们还不能确定。

3.家乡是否曾被日军长期占领对日本观的各个成分均无显著影响。本项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战时历史问题的影响已经不再占据主要位置。

4.家庭文化程度仅对日本观情感成分具有显著影响,从标准回归系数上看,家庭文化程度越高的大学生对日本的情感态度越消极。但这种影响强度较小且在其他三个模型中没有显著性,如何对这一情况做出合理的解释,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5.家庭经济水平对日本观的各成分均无显著影响。与经济条件相比,态度的形成源于更加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大学生的日本观并不受家庭经济水平的显著影响。

由于以上五个因素在日本观各成分的独立模型中呈现的影响普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以日本观总值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剔除该五项因素,集中考虑社会心理四项因素对日本观可能造成的影响。从总体上看,社会心理因素对日本观的各成分都有巨大影响,表 17 中所示四个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分别达 35.2%、31.8%、37.6%和 44.8%,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1.长辈态度因子仅对认知成分具有显著影响,但标准回归系数为负,即长辈对日态度越消极,态度主体的对日认知水平越高。同辈态度因子对日本观及其情感成分、行为倾向成分均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呈正向,即身边同辈群体的对日态度越积极,则态度主体的情感和行为倾向也更加积极。这一组结论说明,大学生不仅更愿意遵循自己和周围同辈群体的判断,更容易对长辈的不同观点产生抵触。

2.正面信息因子对日本观无显著影响,负面信息因子仅对认知成分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呈负向,即态度主体从媒体接收的涉日负面信息越多,其对日认知水平越低。这一组结论表明,尽管媒体传达的正面信息没有对受访大学生的日本观

产生显著影响,但其传播的负面信息却制约了态度主体的对日认知程度。可以说,媒体对日本消极形象的塑造对于大学生增进对日了解起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3.正面教育因子对日本观及其情感成分、行为倾向成分的影响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负面教育因子对情感成分与行为倾向成分具有显著影响。可见接触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日本信息与文化,有助于帮助态度主体增进对日本客观情况的了解,从而理解日本社会的特性,更加理智地对待日本问题。对战时侵华历史的强调,则会显著增加态度主体对日本及其国民的仇恨。

4.直接接触因素对日本观及其各成分均具有显著影响,说明态度主体与日本发生的直接接触明显有利于提高其对日印象。这一方面印证了沟通本身的重要性,一方面也得益于沟通带来的共情。

5.自我检控因素对日本观及认知成分、情感成分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态度主体所进行的自我反思能够使其对日认知及情感发生趋于积极的转变。本研究发现,当态度主体能够通过自我检控,对将带有自身文化烙印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判断标准强加于人的行为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时,其对日认知、情感及整个日本观都会发生有益的变化。

五.结论与讨论

上文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描述了大学生日本观及其影响因素的现状,并运用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就各因素对大学生日本观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概括而言,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第一,从总体上看,日本观趋于积极的大学生比例略高于消极的大学生,大部分大学生的对日心理倾向不在极端,处于中间水平,基本推翻了中国多数大学生持“反日情绪”的观点,也为反驳“大学生对日态度激进”的说法提供了依据。从日本观的构成成分上看,大学生的对日认知水平较低,对日本的客观情况了解甚少;对日情感也比较消极,对愤青群体的评价高于对哈日群体的评价,但能够将日本政府、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民区别对待,情感仍有矛盾之处,凸显出对日情感的理智性和复杂性;对日行为倾向相对积极,对于接近日本、了解日本有着很大的主动性,说明大学生对日本经济和文化抱有相当程度的肯定,存在着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意愿。

第二，家乡是否曾被日军长期占领与家庭经济水平对大学生日本观的形成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性别、城乡差异、家庭文化程度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需要进一步研究予以确认。

第三，在对社会学习因素的考察中发现，日本观具有显著的代际差异，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发展印记，即大学生同辈群体的对日态度较父辈积极，父辈的对日态度又较祖辈积极，但大学生对待同辈群体观点与长辈意见存在着完全相异的态度，对家庭涉日教育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媒体宣传方面，传达日本负面形象的信息知晓率远高于传达积极信息的信息，而负面信息对认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呈负向，可见媒体涉日宣传的倾向性及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第四，涉日受教育水平方面，从受教育的强度上看，在大学生中最有人气的日本文化是动漫，其受欢迎程度远高于日本的其他文化产品；从受教育的深度上看，大学生接触得较多的是日本电影和电视剧，其次是中国拍摄的二战影片和日本音乐。从总体来看，文化产品本身所带的价值倾向性决定了教育效果的差异，正面教育与负面教育分别对情感成分、行为倾向成分有着积极与消极的显著影响。因此，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必须同时进行，一味强调日本侵华历史只能强化反日情绪，导致对日本的无知和情感的僵化。

第五，与日本人或日本发生过直接接触的大学生较少，但接触后体验普遍积极，大部分大学生的与日接触后印象为“很好”或“比较好”，回归分析结果同样验证了这种印象对于提高对日印象所起的积极作用。足见与日接触不但没有造成消极后果，还有利于大学生增进对日了解，促进换位思考，塑造积极的日本观。

第六，回归分析同时发现，自我检控因素对态度主体积极调整日本观能够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从大学生自我检控的现状上看，曾经经历过对日问题反思的大学生占据很大的比重，促成他们反思的力量主要来自知识教育、媒体宣传和民族情感。过半数的大学生关心日本发展与中日关系并进行过换位思考，但了解日本国民性及国民心态的大学生则相对较少。可以说，大学生具备进行反思的主动性和外在压力，但由于认知水平及信息局限，能够做出客观判断的人并不在多数。这一现象带来的启示在于，如果教育与媒体加强涉日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及客观性，就能够帮助大学生获得理智的日本观。

总而言之，当前大学生的日本观呈现出趋于理性、趋于积极的趋势，但受到

教育方向、媒体宣传与接触机会的限制，大学生了解日本、理解日本的进程受到了较大的限制，本研究认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与接触机会的增加，通过调整教育方向和媒体宣传，大学生的日本观必将向着更为理性、健康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社会学系)

参考文献: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apan, 2007, "Japan-China Relations Enter a New Era".

陈生洛，2003，“中国大学生对日本的想法”，《青年研究》，第11期，第22-29页。

陈生洛，2006，“中国大学生的美国观与日本观比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6期，第27-30页。

陈志姣，2006年，“中国青年对日态度研究”，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文库。

冯昭奎，2005年，“日本大学生看对华关系”，《世界知识》，第24期，第28-30页。

侯玉波，2003年，《社会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加加美光行等，2005年，“对日本，还要‘区分论’吗”，《世界知识》，第17期，第54-61页。

蒋立峰，2002，“中国民众对日本很少有亲近感——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结果分析”，《日本学刊》，第6期，第1-18页。

蒋立峰，2004年，“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亲近感显著增强”，《日本学刊》，第6期，第6-32页。

金熙德，2007年，“‘千变’日本：中国人眼里的日本形象”，新华网。

李浩升、石城，2005年，“大学生群体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对南京高校1000名学生的调查”，《青年研究》，第3期，第9-16页。

铃木英司等，2002年，“中国人·日本人：我眼里的你是什么样”，《世界知识》，第14期，第32-38页。

卢德平，2002，“北京大学生眼中的日本”，《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第52-55

页。

马立诚，2002年，“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中国外交研究》，第6期，第41-47页。

尚会鹏，2004年，“儒家的战略文化与中国人日本观的深层”，《国际政治研究》，第2期，第60-69页。

王屏，2003年，“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日本学刊》，第2期，第33-47页。

吴健一，2003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及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文库。

武克全，1997，“中国人认识日本的误区”，《探索与争鸣》，第10期，第42-48页。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年，“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报告”，《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第19-25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2年，“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日本学刊》，第6期，第19-23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4年，“第二次中日舆论调查”，《日本学刊》，第6期，第33-38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6年，“第三次中日舆论调查”，《日本学刊》，第6期，第27-31页。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